

常宁西庄源（下）：名震一方

隐居三载才思涌 写就《黄书》播火种

■文/本报记者 张文凯 图/本报记者 周 围

专家点睛



本期嘉宾：
朱迎光（湖南省船山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、船山学社常务副社长、衡阳师范学院教授）

短暂而厚重的常宁三年

王船山到常宁一共居住了三年，时间虽然短暂，但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因为在这里，他写下了很重要的一部书，叫《黄书》。

《黄书》代表着他的政治观点和政治主张。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，他来到常宁除了隐居外，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联络与他有同样志向的反清人士。此时，除了钻研学术外，他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反清。

在常宁三年，初步显示了他后半生要做的主要事情。一方面，他以教书为生。他自己在文章里说过，他通过教书来养活自己、求谋生，但同时通过教书，他又培养了一些人才，为反清斗争做准备。另一方面，他在此地开始静下心来研究中国文化，写下了或者准备写下一些重要著作。

所以，常宁的三年，既是他反清斗争的三年，也是他研究中华文化三年，也就是他自己说的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的三年，这三年在他的人生当中，虽然短暂，但意义巨大，出品丰厚，也是他的思想初步成熟发展的重要阶段。

代表诗词

居西庄源三载将去赋诗

西庄源所居，后岭前壑，古木清沼，凝阴返映。念居此三载，行将舍去，因赋一诗。

物遇日屡迁，流止智不遣。浮云出丹嶂，游蝶遶绿漪。

心知既无滞，躯原匪有期。俯仰同久乍，令我奄奄兹。

修竹丛尚稚，蒹葭萌每移。云岫半明天，霞峰时参差。

坐闻春鸟鸣，亦睹秋叶离。凌晨送圆晖，迎爽却凉晖。回首

舜帝峰，濯足春水湄。

芳草良未歇，佳期行可规。行道苦已靡，稿木今何居，俄顷已

籍用，乘兴将焉之。

新秋看洋山雨过

南楚秋风日，轻阴太白方。参差分远岫，明灭逗斜阳。度微云间树，还吹山际香。鹭飞初掠渚，燕语乍聆凉。云断天逾碧，林疏野乍光。余霞侵月浅，晚雾过溪长。薄袂冷冷甚，闲愁鼎鼎忘。萧萧聊隐几，吾道在沧浪。

为晋宁诸子说春秋口占自笑四首

腹借征南库，灯邀汉寿光。伤心难自遣，开卷是春王。露死魂犹失，乌饥远视仍。纸窗钻不透，大抵是痴蝇。南岳经声苦，东林眉宇频。似他强强笑，犹恐隔邻嗔。浚漳宏演肝，伊川幸有泪。未知家则堂，云何宣此义。

西庄源

古树何年种，归禽来一双。芳斋读易罢，摄影入闲窗。

小祇园

宛转破千障，平地起绿烟。自然知兰若，不过鸟飞边。

史料摘登

《嘉庆常宁县志·人物志·流寓》

王夫之，字而农，衡阳人，崇禎五年未午举人。甲午由南安移居常宁之西庄源，丙申生子王敦，丁酉复返南安。寓宁三载，为邑人说春秋，居游多有题咏。

《洋泉王氏宗谱》

在昔船山宅屯于兹，历载凡三，是生子敦，乃携而归衡山之阳，赋诗纪别。迄今二百余年，此间父老往往能传其轶，想与播为美谈，曰洋泉王氏者，是皆船山之所避风雨也。”



西庄源

王船山在常宁的日子虽然清苦，但还算自在。《（嘉庆）常宁县志·流寓篇》有载：王夫之寓宁三载，为邑人说春秋，居游多有题咏。

他以教书为生，以歌咏为乐，成为清初常宁文坛的四大“领袖人物”之一。

船山成为常宁文坛“领袖”

王船山在西庄源的日子虽然不富足但应该是快乐的。这里不仅有他的同宗好友，还有他的知己，和一批仰慕他才华的读书人。用王之春的话说，“常宁文士来者益众”。

殷铭、阮鄂就是王应章、王船山共同的朋友。

殷铭与王船山最是“同病相怜”。两个人年少时都在衡州府读书胸怀天下，后都在战乱中经历了“身世浮沉雨打萍”的漂泊，到最后为生计所迫开馆授徒作了老师。听闻殷铭的诗文集准备出版时，王船山为其作序——《殷浴日时艺序》。在序言里，船山不写文学流派、写作技巧，只写两人的交往，词真意切。而殷铭人生最大的成就，就是主笔撰写了《康熙常宁县志》，其中录入了王船山的诗文及与一些人相互酬答的文章。

阮鄂，清代初期画家，写得一手好诗。他的父亲阮浣洲，明国子监大学生，崇祯六年（1633年）任北京中城兵马副指挥，后升华州（在陕西）同知，又例升江西按察司，摄奉新（属南昌府）县事。巡抚令其管理贡院秋试时的治安，事毕即请假返乡。清顺治七年（1653年）过世，应阮鄂请求，在顺治十二年（1655年），王船山为其过世四年的父亲写了一篇墓志铭《阮浣明先生墓志铭》。

铤铤四人行。王船山在常宁停留的三年多时间里，四个人多有往来。捡一个风清云淡的日子，一同出游，好不快哉！

常宁县令张芳非常仰慕先生才学，尤其喜欢王船山写的《落花诗》，常赞叹不已。张芳是江苏句容进士，清顺治十一年来常宁任职。他最喜风雅，曾经组织了常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采风活动，组织当地的文人土士把常宁的名胜游个遍，留下了一批歌咏常宁的诗作。听说先生来了常宁，他挥笔写了一封信《与王而农书》，叫人送了过去。张芳的这封信写得热情奔放，溢美之词毫不吝惜。文章极力称赞王船山学问渊博、人格高尚。他说：“以王先生学解深投，传诸其人，且暮遇之可期也。虽井中铁函，不以易河汾之论著矣。何时得一披帷启秘，极尽夫人之际耶。”这是一名清朝的在职官员，对被朝廷通缉的前朝遗臣的评价。

王祚隆是最懂王船山的。他们都喜欢研究《易经》，相互间经常有诗书往来。王祚隆，是常宁读书人中影响力最大的一个，顺治十四年（1657年）被聘为岳麓书院山长，任期7年，一时名噪江南，被誉为“屈宋传人”。在王祚隆的眼里，王船山是孤傲的。“美人坐清湘，闲吟复长啸。十旬五得饥，体瘦容愈少。冠盖时叩门，千金不一笑。道逢衣褐游，风雨怜同调。困之得素心，白日能相照。途长时亦难，出处各自助。”（《酬王姜斋先生》）寥寥数语，写尽了王船山的不屈与执著。

王船山以诗会友，成为了明末清初常宁文坛的“领袖”人物之一。明末清初的常宁，形成了四个有特色的文人雅士集群。一是以“诗人县长”张芳为核心，以当朝官更为创作主体的集群；一是以岳麓书院山长王祚隆为核心，以长沙岳麓山为活动中心，以名流学士为创作主体的集群；一是以且拙禅师为核心，以大义山至圣寺为活动中心，以佛教僧人为创作主体的方外文士集群。还有就是以王夫之为核心，以洋泉西庄源为活动中心，以慕名交流、求学的文人学子为创作主体的文士集群，主要成员包括王夫之、殷铭、李日炜、吴际隆、阮鄂、殷四明、李长旦、吴震生、崔翟。

在洋泉镇，王船山拥有了自己的“朋友圈”。友人的收留和关怀，让他有了栖息之所，和难得的宁静生活。顺治十三年（1656年），他的儿子王敦在常宁出生，王敦后来把父亲的著述整理成《船山遗书》。



传说是王船山亲手栽的樟树



采访王氏后人

在西庄源的三年，王船山只做了两件事情：教书和写书。

开门七件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件件事情都要钱。为了生计，在友人的帮助下，王船山第一次开馆授徒。此后，“教书”成为他养活自己及家人的主要谋生手段。

《曲潭李氏宗谱》对此事有记载。原来，先生与居住在常宁曲潭的李柱臣是“忘年交”。李柱臣是当地的大学问家，但是对于《春秋》却掌握得不够透彻。于是聘请王船山在洋泉镇的六合寺，给儿子李复旦讲授《胡氏春秋》。当时来上课的人，应该不少。居住在常宁市罗桥镇东桥村的吴氏后人在其《吴氏宗谱·澹雅山斋记》中记载说：“距吾家七里许有西庄源者，王船山先生侨寓所也……邑人从而问业者甚众。”

王船山讲课的六合寺，是洋泉镇大户人家欧阳氏的族寺。60多岁的欧阳仙释，退休之后开始打理“欧阳氏宗祠”，闲暇时翻阅家传的宗谱。他说，六合寺在建国初期还有，后来就毁了，在洋泉镇农技站的位置。在欧阳仙释的指引下，我们一起来到了六合寺旧址。他告诉我：“曾经听老一辈的人说，王船山曾经在这里教书。”

我向远处眺望——这是一片田垄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在整畦的稻田间，我仿佛看到有个清瘦的身影向我们走来，走进传来琅琅读书声的西庄源。

王船山经常为大家讲授的是《周易》《春秋》，类

三载春秋，他只做了两件事

似于现在的“高考补习班”，为学子们参加科举考试进行考前复习。王船山把父亲毕其一生研究的《胡氏春秋》心得和自己数十年治心得融会贯通，悉数倾囊而授。

王船山虽然生得一副铮铮铁骨，但在生活中也是一个极其风趣之人。在《常宁民间故事》中有王船山的传说四则，其中有则《心送朋友三十里》的故事。有一次，他的一位好朋友到西庄源来看他。他们俩谈起学来是津津有味，一直谈到了第二天早上。早饭过后，朋友起身要走了。他就送他下楼，对朋友说：“好，你走吧，我心送你三十里。”朋友当时也没太在意这句话，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。

走着走着，一直走到离西庄源十五里的东塘吴家，才想起刚才王船山在楼梯边送他时说的那句话。他想：刚才王船山还说说要送我三十里，后来连楼也没下来，怎么能说是送我三十里呢？他感到十分奇怪，于是又折回西庄源去问。当他再次走到王船山住所时，却仍然看见他站在原地，一步未动。他便问船山：“你刚才说要送我三十里，可是你连自家的楼梯都没有下，怎么能说是送我三十里呢？”

看见朋友去了又回，他也感到很惊讶，便问他：“你刚才已经走到哪里啦？”“我已经走到了东塘吴家。为了问清楚你讲这句话的意思，才又返回来了。”王船山又问：“东塘吴家离这儿多远？”“十五里。”“东塘吴家离这儿十五里，你又从东塘吴家返回来，又是十五里，这不正好是三十里吗？我现在还站在这里送你呢。”两人相视而笑，朋友转身挥袖而去。

不能久留，王船山挥别西庄源

我知道，西庄源的清风明月，并未能真正抚平先生心头苦楚。细谈他的《为晋宁诸子说春秋口占四首》，我触摸到了他的不甘与坚守。他嘲笑自己是“腹借征南库，灯邀汉寿光”。伤心难自遣，开卷是春王”。一位有着治国谋略却不能为国效力的经世之才，却只能在常宁这样偏远的地方教书度日，怎不让人辛酸？即使这样，他仍然像饥鸟一样，像痴蝇一样，坚守着自己的操守。“蠹死墨魂失，鸟饥远视仍。纸窗钻不透，大抵是痴蝇。”

西庄源三年，王船山拥有了战乱后的短暂宁静，他开始了对家国命运的深度思考。《王船山年谱》记载：顺治十二年（1655年），始作《周易外传》。八月《老子衍》成；顺治十三年（1656年）三月，《黄书》成。

《黄书》犹如一篇“民族宣言”，对祖国壮丽的山河、丰富的物产、悠久的历史、“博衣、弁带、仁育、义植”的文物教化，充满眷恋之情。通过《黄书》，王船山阐释了他的治国理念。

他认为华夷大防是天设地造、绝对不容混乱的道理。在他看来，黄帝一心以萌庇天下为己任，保卫华夏之疆土，以防止异民族的侵犯为最高职责，所以他没有“私神器（国家社稷）以貽曾玄之心”。他极力抨击孤秦、陋宋，因为他们只图巩固一人一姓的地位，不惜钳制臣民、削弱中国，而漠决了华夷大防。他对民族利益的关心超过了天经地义的忠君观念。为了抵抗异族，他主张地方分权，增强边区的防御力量，优待中央和地方的官员，给他们以相当的职权，不要加以牵制。

《黄书》七篇是一个完整的体系：首篇《原极》为全书之纲，论圣王严华夷之辨是效法天则。其余六篇，分题论述。《古义》说立国遵古；《宰制》讲军区设置；《慎选》言慎重选举；《任官》明任官勿疑；《大正》申廉正之风；《离合》阐治乱交替。七篇相合，成为一套完整的治国方略。

《黄书》蕴含了极为丰富的民族主义思想，所以到了清代末年的反抗满洲贵族的革命斗争中，成为当时掀起一股尊黄思潮的“酵母”，为辛亥革命的成功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。不舍离去，王船山独自一人在西庄源四周转了转，内心五味杂陈、百感交集。他怀着复杂心情写下一首五言长诗。这是一首写景抒情诗，描写了西庄源周围的山光物态和四时变化，抒发了愁绪萦绕挥洒不去的苦闷。他说：“行道昔已靡，稿木今何居，俄顷已籍用，乘乘将焉之。”

先生带着家人离开了常宁，带着中华民族如何复兴的历史命题，走上了继续求索的道路。

大抵是痴蝇。”